

□ 本报记者 卢星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汉朝官员,与修习儒术的贤良、文学,在京师就盐、铁、酒等专营政策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论辩,历时5个多月,史称盐铁会议。汉宣帝时,桓宽(生卒年不详)据会议记录撰成《盐铁论》一书,成为后世了解会议争论的主要材料。



滕州汉画像石中的鼓铸打铁场面(拓片)。

为衰败埋下隐患

参加盐铁会议的具体人数,按照桓宽的说法,贤良、文学有“六十余人”,加之大夫、丞相以及御史、丞相史和从事会议记录的相关人员,估计将近百人。《盐铁论》十卷六十篇文章,除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桓宽的自序以外,其余文章几乎全部是以双方对话、反复辩论的形式出现,只是在其中夹杂了近二十处简短的叙述或描述性文字。

若从《盐铁论》的文本推断,这次会议可能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会议大致属于“正式”会议,所以参加人员较多,会议规格较高,有具体的主持人,会议基本上按照一定的议程进行,最终形成决议,还有了对会议情况的上奏,并得到皇帝“所奏可行”的明确批复,这说明“这次会议到此已正式结束”;第二阶段的会议大约属于非正式的会议,因为没有丞相和丞相史参加,可能在御史大夫处举行。

点燃这场大辩论的人,实际是汉武帝。这位文韬武略的皇帝在位时,为了稳定国内生产局势、集中精力对抗匈奴,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和财政措施,如盐铁酒官营、铸币权收归中央、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

盐铁酒官营,就是将盐、铁、酒这些利润丰厚的商品,由政府垄断经营;铸币权收归中央,是因为在汉武帝之前,地方的各郡、诸侯国都有铸币权;均输指的是将郡国应缴贡物转运至高价地区销售,赚取差价;平准是通过贵卖贱买稳定物价,抑制商人囤积居奇;算缗是向工商业者征收高额财产税;告缗是鼓励百姓举报隐匿资产者。

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为打击匈奴、开疆拓土提供了坚实的后盾。然而,汉武帝时期的军事行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年累月、不死不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导致国库空虚。而“盐铁官营”等政策如绞肉机一般搜刮着民脂民膏,造成民不聊生,盗贼四起,阶级矛盾变得异常尖锐。

武帝去世后,昭帝上台。此时内部存在的诸侯国问题早已解决,匈奴的威胁也基本消除,但盐铁酒官营的惯例仍在延续。因此,不管是在朝堂,还是在民间,“废除盐铁酒官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昭帝的支持和丞相田千秋的支持下,政府官员与贤良、文学,分成两大阵营,就“要不要继续执行盐铁酒官营”这一论题,展开了唇枪舌剑,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

辩论会上有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核心的政府派,另一派是以贤良、文学为核心的民间派,两派执不同的观点,展开激烈的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对汉昭帝时期国情的新一轮评估,以及对武帝在位时期一系列政策的全面评价。

在讨论中,贤良、文学全面且激烈地抨击了汉武帝时期制定的政策,强烈要求取消盐铁酒官营、均输等政策,认为武帝时期施行的一系列经济、财政措施导致了“行奸卖平”“农民重苦”“贱以区贵”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平民老百姓的利益,使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桑弘羊则认为,中央应当坚持立场,强调法治的同时崇尚功利,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并坚持认为武帝的一系列政策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发展农业生产、禁奢靡、抑兼并的可靠措施。双方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无论是以桑弘羊为核心的政府派还是以贤良、文学为核心的民间派,均通过举例、援引等方式来证明自身论点,直至辩论结束也未形成统一观点。

盐铁会议是汉武帝实施“盐铁官营”政策之后最重要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毫无疑问,这场辩论的结果也影响到后来汉朝经济、财政政策的走向,同时也为汉朝武帝之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经典重温

《盐铁论》：垄断和开放的拉锯

通读《盐铁论》一书,可见作者偏向民间派的立场。除《杂论》之外的五十九篇文章主题各不相同,文章结构上也长短不一,但其中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即几乎全部文章都是以文学、贤良的发言作为结束段落。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文章结构形式,实际上大有寓意。因为在双方的辩论之中,最后发言者,往往带有总结概括全篇的意思,表明他们在论辩逻辑上占据上风。虽然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文学、贤良在论辩中因抱残守缺而导致的理屈词穷,但作者的这种固执安排暗含了对其观点的认可。

虽然盐铁之议发生在两千多年前,但是这场关于国家经济、财政政策的讨论,其时代意义并不局限于彼时,直至今日仍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客观地说,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适度地发展国家工商业,这本是无可厚非的。盐铁会议上的文学、贤良对此却



画像石中的井盐生产场面。

大加指责且激愤不已。究其原因,文学、贤良这批来自社会下层、对民情有比较深刻认识的儒家学者,由于坚守着儒家重德轻利的基本思想立场,所以也就自然地认为,政府提倡、重视发展工商业,必然会致天下趋末而弃本的不良后果,同时又势必造成对“本”,即农业的相对轻视。所以文学、贤良激烈反对的倒不是盐铁国营政策本身,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这种政策实施之后的社会负面影响与治国的政策导向。

对大夫而言,在当时激烈论辩是否改变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大环境下,论辩的胜败,不仅直接牵涉到对大夫以往的功过评判,更牵涉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问题。所以,他们把提出“以政府之力,经营具垄断性的工业和调节盈虚”这一构想的管仲搬出来。而现实则是最好的论据。

盐铁会议之后,政府部分采纳了贤良、文学的建议,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但重要经济领域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盐铁之议表面上是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国家现状变化之后,利益冲突之下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调整。古今中外,有众多经济学家就国家垄断和自由经济两种制度展开讨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便是基于自由经济这一思想形成的经济学理论,欧洲完成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在《国富论》的指引下开始了扩张和掠夺,虽然使国家在短期间内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也造成了黑奴贸易、殖民扩张、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周期也在提示着世人——“完全的自由经济是不可行的”。

那完全的国家垄断是否可行?反观上世纪苏联的经济史便可解答这一问题。

作为国家垄断典型形态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在特定历史阶段实现了重工业与国防工业的跨越式发展,使苏联迅速跻身世界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该体制长期忽视市场信号与价格机制,导致轻工业、消费品制造业及服务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严重扭曲;加之缺乏微观主体的自主决策权与利润激励,劳动者与企业管理者生产积极性受抑,最终制约了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增长与创新活力。

那究竟怎样的经济和财政制度才是最好的呢?其实,答案并非在“国家垄断”与“自由市场”之间作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择,而应立足于历史阶段,战略目标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动态匹配。国家垄断与市场经济并非本质对立,而是可在不同维度、层级间实现功能性互补与制度嵌套。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汉。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实为应对匈奴威胁、强化中央财政汲取能力、支撑大规模军事动员的阶段性制度安排,其本质是以国

家资本主导关键战略物资,服务于国家安全优先的发展逻辑;而至昭帝时期,外患缓和、民生凋敝,遂召开“盐铁会议”,部分放松专营,鼓励民间参与流通与生产,以恢复经济活力、稳定社会秩序——此即制度弹性与政策时序适配的古典范例。由此引申,对任何经济与财政政策的评价,必须摒弃静态优劣判断,而是将其置于特定时空背景中,评估其成本收益、效能与可持续性。或许这就是历史常看常新的价值所在。

相关阅读:

- 1.《盐铁论校注》,桓宽著,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2023年版;
- 2.《盐铁论集解》,聂冬著,凤凰出版社2018年出版;
- 3.《国富论》,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



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的逻辑

□ 洪银兴

这里讲的人文经济学,既不是人文学科,也不是经济学,而是人文与经济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理论和实践的学理性表达。现实中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做到人文与经济的良好结合。有的地方文化繁荣但经济未必发达,有的地方经济发达但文化并不繁荣。关键是寻求经济和人文相互转化的逻辑和机制。本书主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来研究经济和人文两者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深层逻辑和内在机理,从而探讨体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模样。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只表现在经济上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还表现在建成文化强国。在丰富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不仅关系到现代化的目标设定,也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原动力所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体现为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人文发展需要经济基础,经济发展需要人文支撑。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的人文精神基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本身需要经济支撑。在现实中,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有自发的潜移默化的因素,但政府因势利导的组织和引导不可或缺。有的地方文化底蕴很深但没有转化为经济的繁荣,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但文化相对落后,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有意识的引导和组织。

中国式现代化包含文化现代化,即建设文化强国。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是有区别的。经济现代化有个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文化现代化虽不排除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学习和交流,但不完全是追赶发达国家,更不是文化的西化,而是体现文化自信。中国式的文化现代化包括哪些内容?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和积淀,有条件在保持传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高起点发展体现时代和科技特征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现代化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承历史文化,二是融合现代文明,三是科技创新。以此为内容的文化现代化,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江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从古到今都很发达,尤其是近代以来。研究该地区经济和文化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所包含的人文经济学,可以发现其内在的逻辑是“文化一人一经济”。三者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中实现共同繁荣,即以文化人,以文化人,以文化人。这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的写照。按此逻辑可阐述经济与人文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从中探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相促进的规律,特别是探讨经济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文化基因。这种研究对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样板价值。

(作者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书单

《地图上的中国通史》

吕思勉 著
李太白 绘
人民日报出版社
通过地图的形式,全面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涵盖从古代至近代的重要事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以独特的视角,结合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地图,揭示了民族起源、文明发展、朝代兴盛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影响。通过对历史事件、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的深入分析,提供一个理解历史发展的全新视角,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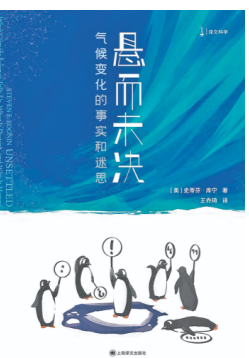
《向心城市》

陆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学术普及读物,也是陆铭前作《大国大城》的姊妹篇。说明了城市内部的发展规律,即随着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在“规模经济”的逻辑下,城市发展呈现出“人从农村集聚到城市,从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从城市的外围集聚到中心城区”的规律。再次引入“空间均衡”的概念,从“活力”“宜居”“和谐”这三个城市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出发,论述了在国家、地区、城乡、城区、郊区等层次中,应如何顺应“向心力”所塑造的普遍规律与趋势,进行规划与选择。



《悬而未决：气候变化的事实与思虑》

[美] 史蒂芬·库宁 著
王乔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如今,气候危机的预言比比皆是。随之而来的是焦虑和恐慌。事实上,从研究到报道再到大众媒体,到处充斥着被误解和错误的信息。核心问题“气候如何应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它将来带来什么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答。尽管温室气体排放量急剧上升,但从1940年到1970年,全球气温实际上是下降的。更重要的是,用来预测未来的模型并不能准确地描述过去的气候,这表明它们存在严重的缺陷。该书提供了关于气候科学的真相——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以及这一切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记者 蔡可心 整理)

还原历史,是反思的前提

□ 南香红

2002年,因为一次采访,我走进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中国东北的日本731细菌工厂,强壮的中国男人体内被注入了鼠疫、霍乱、炭疽、鼻疽、破伤风、气性坏疽等各种病菌,成为培养细菌的活体;他们被关在秘密的牢房里,观察、取样、放血,然后被送上手术台解剖,最后被投进焚尸炉里烧成灰烬。而用他们的身体培养出来的细菌,却活着,被制造为致命的细菌武器,配合作战,撒播或投放到中国人口集聚的重要地区。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国家民族的灾难,也许是许许多多家庭的灾难,然而这场战争中还有一场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更残酷的战争——细菌战。

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投爆,使核武器对人类的毁灭性危害成为举世皆知的常识;而生化武器的杀戮力,那如来自地狱的恶魔般的邪恶,远不为世人知晓。细菌武器的危险较核武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战争已过去80年,那些被攻击污染的地区仍然可以检测到病菌,仍

然存在着威胁人类生存的安全隐患。

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而中国的细菌战鼠疫幸存者,崇山村的王锦梯,却在孤独和悲哀中死去。王锦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作为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媒体的镜头前,奋力向世界发出呐喊,但掩盖、遮蔽、遗忘的幕帐太厚重,这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从战时到战后几十年,细菌战对个体生命的戕害,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对人伦关系造成的破坏等,还有待于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直到今天,细菌战仍然是日本国家最高层的“taboo”(禁忌):不承认事实,不公开资料,不道歉赔偿,对受害者的诉求置之罔闻。

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所以还原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中日战争一直是两国之间绕不过去的巨大沟壑,细菌战问题是其中犹在流脓的疮疤。731细菌工厂和细菌战的残酷,已然成为历史,但细菌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则一直延续到现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细菌战仍未有结束,是仍在行进中的历史。作为一名记者,所能做的不多,唯有记录,也唯有记录能够永存。

反思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反战力量的揭露,一点一点材料的发现、发掘、拼凑(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新的材料还在发现中),使细菌战事实慢慢地浮现出来;1997年,中国受害者加入,他们从控诉自己、亲人、家庭的受害开始,成长为村庄、乡镇、城市受害历史的调查者,一沙一滴的力量,最终汇成修补历史的民间行动。

对日细菌战诉讼经过十年三审,虽然以败诉告终,但日本最高法院全面认定了中国180名受害者举证细菌战事实,第一次从法的层面认定细菌战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的伤害,从而使细菌战这一日本国家秘密被披露,被认定、被世人所知。

日本立教大学历史学教授上田信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日本,有些人是希望随着战争亲历者的年高辞世,这件事就翻篇,成为过去。”赶在当事者日日老去,将记忆带进坟墓——“历史窗口关闭”之前,把事实记录下

来就成为当务之急。崇山村的王锦梯,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但他和他的同伴调查出的1240人受害名单,已经雕刻在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上。纪念碑上的一个个名字,曾经是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但却死于“日本人放的鼠疫”。这就是中国人的“哭墙”,细菌战第一次有了世界性的言说场合,有了“记忆场”。相比犹太人建造的战争受害纪念碑,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却是一次对战争创伤的抚慰、宣泄和纾解,是一次战争创伤的集体治疗。

浩瀚的档案,纷繁的材料,无数的当事人,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极考验写作者的体力、耐力、智力和学识。我需要做的是耐心、修筑通向塔顶的天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的场景和细节,发掘每一个故事,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并看见。希望读者在这本书里,不仅仅看到事实和事件,也看到故事——看到一个生命的故事,看到每一个生命发出的、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本文为《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序言,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